

地域差异视角下农村光棍的形成原因分析

杜 姣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以广西、山西以及川西平原等地农村的调查经验为基础,引入地域差异的视角,从婚姻竞争市场的卷入程度、婚姻成本和对代际支持的依赖程度等维度对不同地区农村不同主导光棍类型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解读,揭示我国农村光棍形成原因的复杂性。研究发现,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较高以及所处地理区位和经济条件状况相对较差的农村地区,形成了主要归因为婚姻市场竞争失败的光棍群体;婚姻市场卷入程度不高但通婚圈内婚姻成本较高且对父母的资源具有较大依赖的农村地区,形成了父母责任缺失型光棍;而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较低,且婚姻成本不高和对父母资源依赖较弱的农村地区的光棍类型主要表现为自致型。

关键词 农村光棍;地域差异;光棍类型;婚姻市场;婚姻成本;代际支持

中图分类号:K 2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8)02-0113-07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8.02.014

目前,光棍问题已然成为我国婚姻问题的焦点,并作为时代问题凸显在国人面前。据相关学者估计,截至2020年,我国会存在3 000万的隐性光棍群体^[1]。较之于城市,农村更是光棍问题的重灾区。据刘燕舞在多地农村调查的质性经验判断,当前全国农村光棍的实际数量大约在2 000万左右^[1]。庞大的数字背后,隐藏的是光棍群体所面临的个人危机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中国农村家庭是兼具生活性、社会性与宗教性的三位一体单位^[2]，“成家”是完整家庭单元形成的必经阶段。剥夺农村男性青年的婚姻,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剥夺他们以家庭为载体的意义实现。光棍往往因不能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而丧失人生奋斗的动力,进而成为村庄中不受欢迎的群体,为村庄主流文化所排斥^[3],在家庭内部、人情交往、公共生活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处于多重边缘地位^[4]。此外,庞大的光棍群体还存在一定的社会风险,对社会结构造成冲击,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1]。光棍问题的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对光棍形成原因的研究存在宏观主义和个体主义两种解释路径。宏观主义的解释路径将光棍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男女性别的结构性失衡。打工经济的兴起又直接导致了农村通婚圈的扩大^[5],进而加剧了农村女性向更发达地区的流动,农村男性处于婚姻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6]。如今农村社会中大量出现的婚姻市场要价行为导致的农村男性婚姻负担过重,也是光棍形成的重要原因^[7]。这背后实则反映的就是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以及农村人口流动的加快所带来的婚姻市场资源的不均衡配置问题。个体主义解释路径将农村光棍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经济条件、个人交往能力缺陷等因素,比如陈锋认为,“男性的情感交往能力较差成为新时期农村光棍现象产生的主导性因素”^[8]。

上述研究揭示了农村光棍形成原因的重要面向,丰富了我们对农村光棍现象的认识。但由于其旨在探究农村光棍产生的普适性和一般化原因,光棍在不同地域农村的差异化表现(比如光棍的数量以及类型)没有得到必要的关注。为此,本文拟以笔者在广西、山西以及川西平原等地农村的调查经

收稿日期:2017-04-0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研究”(14JZD030)。

作者简介:杜 姣(1990-),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乡村治理。

验为基础,引入地域差异的视角,从全国婚姻竞争市场的卷入程度、婚姻成本和对代际支持的依赖程度等维度对不同地区农村产生不同光棍类型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解读,揭示我国农村光棍形成原因的复杂性。

一、调研的基本情况

2012年7月、2014年7月、2015年5月,笔者相继赴川西平原H村^①、广西X村和山西T村分别开展了为期20~25天的驻村调查,着重对当地的光棍现象进行了了解,采取个案访谈的方式搜集材料。访谈对象既有村组干部、村庄精英、所在乡镇的乡镇干部,也有普通村民,也包括光棍本人。

实地调研发现,这三个地方的农村都存在规模大小不一的光棍群体,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除了都有少量因历史因素、身心缺陷等原因形成的光棍外,各个地域农村还有占据一定比重的主导光棍类型,且在形成原因上表现出相应的差异。广西X村主要是婚姻市场竞争失败型光棍,山西T村主要是父母责任缺失型光棍,川西平原W村则主要为自致型光棍。这三种类型的光棍,将构成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农村主导光棍类型差异的地域表达

与光棍相关的研究,在学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大龄未婚青年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该研究对象在年龄上具有明确的上下线。比如刘爽等在研究北京市大龄未婚青年时,将其年龄的下限定为25岁,上限定为44岁,且重点集中在30岁以上未婚的青年^[9]。张春汉等在研究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时,将年龄的下限定为28岁,上限定为44岁^[10];一类是不规定上限的包括所有达到一定年龄的男性群体研究,即“农村光棍研究”。这类研究关于农村光棍的界定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它们多将30岁以上没有婚配过的男性界定为光棍^[3·4,11]。界定的标准主要是根据农村社会的地方认知,即在很多农村村民看来,男性只要过30岁没有结婚,那么想要再娶老婆就比较难,便有一辈子打光棍的可能。他们对光棍群体的划定,与笔者在农村调查的经验相符合。因此,本文吸取既有研究成果,将光棍界定为30岁以上没有婚配过的男性。

1. 广西X村:婚姻市场竞争失败型光棍

婚姻市场竞争失败型光棍,是指随着打工经济兴起、全国婚姻市场形成,因自身的资源劣势导致的在婚姻市场竞争中失败而沦为光棍的这部分男性群体。广西X村所在县为国家级贫困县,X村是行政村,由7个自然村组成,人口有近3000人。该村耕地较少,以山地为主。当地四五十岁的中青年群体,多以割松油为主要收入来源,他们遍布全国各地。二三十岁的年轻群

表1 X村部分自然村光棍数量的年龄分布情况

村庄	人			
	周村	老村	长村	
总人口数	810	780	301	
光棍数量的 年龄段分布	30~39岁	20	9	8
	40~49岁	3	4	3
	50岁及以上	1	4	0
光棍总数	24	17	11	

体,主要是在珠三角地区打工。该村周边群山环绕,交通极为不便。笔者专门统计了该行政村下面3个自然村的光棍分布情况,它们分别是周村、老村和长村,具体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表中的光棍数字为不完全统计,据笔者在自然村老村下面第二小组的细致了解,该组的光棍数量有11人。因此,上述各自然村的实际光棍数量,要远远大于表中数字。这11人中,其中年龄在30~49岁这一区间的有8人,50岁及以上的有3人。表1显示的总体情况与该小组相似,即当地的光棍年龄多集中在30~49岁这一区间,其中又主要集中在30~39岁这一区间内,50岁及以上的老光棍较少。因此,该村的光棍以年轻光棍为主。这说明,当地光棍群体的大量出现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与我国打工经济兴起的时间基本一致。统计的11个光棍案例中,根据光棍本人及村民的陈述,他们之所以打光棍的原因有以下三种:一是经济比较贫困,属于这种情况的有6人;二是

^① 依照学界惯例,本文所涉及的地名、人名皆为化名。

身心残缺,属于这种情况的有3人;三是交往能力欠缺,属于这种情况的有2人。可见经济比较贫困而无法娶到媳妇的光棍占绝大部分。这说明当地的经济贫困,已然不是个体性贫困,而属于地域性贫困。在全国婚姻市场形成的大背景下,因为当地所处地域明显处于全国的经济低洼地带,所以该地农村的男性必然在婚姻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2.山西 T 村:父母责任缺失型光棍

父母责任缺失型光棍,是指因在婚姻大事上缺乏父母的帮助,尤其是资金上的帮助而导致的男性无法结婚所形成的光棍类型。山西 T 村,有人口 707 人,245 户,土地有 3 576 亩,以坡地为主,主要种植玉米、谷子(小米)等农作物。该村由 5 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笔者着重调查的田村是其中的一个自然村,有 300 多人。据不完全统计,该自然村的光棍数量有 10 多个,通过访谈随机搜集到的详细光棍案例有 8 个,光棍形成原因的具体呈现见表 2。

表 2 光棍案例原因构成

编号	年龄	未结婚的原因
1	47 岁	父母不管,家庭条件不好
2	31 岁	父母年纪大,管不了
3	47 岁	家里兄弟多,父母管不过来,年纪又大了
4	45 岁	家里兄弟多,父母管不过来,年纪又大了
5	43 岁	家里兄弟多,父母管不过来,年纪又大了
6	30 多岁	家里兄弟多,父母管不过来,年纪又大了
7	40 岁	腿瘫痪,有残疾
8	40 多岁	父母没本事,不管他

从表 2 的部分案例统计中,可发现,8 个光棍案例中有 7 例在村民看来是由于父母责任缺失造成的。父母责任缺失的情况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纯粹因为父母个人原因,父母自己没有主动承担起帮助子女结婚的责任,编号 1 和编号 8 便属于此种情形;一种是父母虽然有意愿承担帮助子女结婚的责任,但是因家庭儿子实在太多或是自己年纪太大,客观上造成他们缺乏承担的能力,表 2 中的编号 2~6 都属于此种情况。

父母对儿子成家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为他们准备新房和彩礼。改革开放以来,当地的彩礼水平一直不断攀升。大概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当地的彩礼标准在 200~400 元左右。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时候,彩礼上涨至 1 000 元以上,买三金等开始成为必须的要求。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2000 年前后,当地彩礼迅速上升,1.4 万的彩礼水平维系了 7~8 年的时间。近几年来,当地的彩礼水平更是急剧上涨至 6~7 万,一直到目前的 12 万。另外,当地还增加了拍婚纱照、旅游等各种消费项目。这两年开始出现有的女方家庭不要彩礼,但必须要男方家庭到县城买一套房子的情况,所有开支计算下来至少要 20 万。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彩礼水平虽然不高,但父母依然面临着巨大的为儿子成婚的压力。因为,当地的农民家庭具有强烈的生男偏好,以至于造成每个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的儿子,从而带来父母为儿子成婚的负担较重的问题。与父母所感受到的巨大经济压力相反,儿子个人似乎显得相对轻松,几乎不为自己的婚事焦虑。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父母的身上。T 村出现很多父母为了儿子结婚不惜大量借债的现象,当地父母普遍面临着巨大的还债压力。调查中,经常会看到六七十岁的老人,还辛辛苦苦地在地里劳动,或是在附近打工。一问他们为何还如此辛苦劳动,其缘由无一不是要偿还为儿子结婚欠下的巨额债务。

正是因为当地的儿子在结婚事情上对父母过度依赖,所以才导致他们一旦缺乏父母的帮助,就极有可能因依靠他们自身的能力难以支付巨大的婚姻成本而沦为光棍的结果。也因此,当地的光棍主要是父母责任缺失型光棍。

3.川西平原 H 村:自致型光棍

自致型光棍,是指因个人自身因素导致男性没有结婚所形成的光棍类型。个人因素包括个人性格、个人观念、个人品行等等。H 村有 571 户,1 741 人。全村有耕地 2 700 多亩,人均 1.6 亩左右。农作物以水稻、油菜、小麦为主。2000 年前后,该村陆陆续续有农户种植苗木,如桂花、紫薇、兰花等。截至 2012 年,2 700 多亩耕地中有 3/5 用于苗木种植,剩下的 2/5 用于种植粮食作物。苗木种植、外出务工构成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据不完全统计,全村 1 741 人中,有 30 多个光棍,这些光棍均匀分布在各个年龄层次。从对村民的访谈中得知,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光棍,主要有以下原因:一种是成分不好,这部分人在新中国成立之

初被划成了五类分子。

案例 XW 的父亲有三兄弟,父亲是长子,二叔一直未婚,三叔去做了上门女婿。由于受历史成分的影响,没有女孩愿意嫁过来。他母亲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才愿意嫁过来的。二叔已经 66 岁,是个勤劳、肯干、老实的人。本可以通过去做上门女婿来解决婚姻问题,但却遭到母亲反对而一直单身。XW 三叔就是因为没有听母亲话去当了上门女婿。

还有一种是因为个人能力不行或品性不好而没有结婚,比如个人比较懒惰、不务正业等。比如 XL, 35 岁,游手好闲,一年到头回家都不超过两次,时间不超过半个月,从来不给父母钱,甚至还经常问父母要钱。正因如此,本地根本没有女孩愿意嫁给他。当然,还有部分光棍是因为自身有残疾,才没有结婚。由于因历史成分、身体残疾所形成的光棍在各个地区都存在,所以,可成为分析对象的是这部分因个人能力和品性问题所形成的光棍。由于因个人品性和个人能力等个人因素无法成婚的光棍在当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所以说,自致型光棍构成了当地的主要光棍类型。

三、光棍类型地域性差异的形成原因分析

光棍的产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因素的排列组合以及力量的强弱,会形塑出不一样的结果。这一点体现在光棍问题上,就是光棍类型的差异。广西、山西、川西平原分属于我国不同的地域,它们在生态环境、文化传统以及市场的卷入程度上,都存在客观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造就了这三个地域不同的光棍类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村庄边界被打破,大量人口向各大城市汇集,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由此形成。人口的流动,尤其是男女青年的向外流动,改变了传统的婚恋格局。光棍现象作为婚姻问题的一种表现,大量人口的流动是必须要给予考虑的一个因素。农村年轻男女向大中城市流动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形成。在我国总体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必然有部分男性会成为失婚群体,成为婚姻市场中的失败者。对地方农村社会来说,村庄自身的传统也会从一定程度上成为光棍群体形成的助推或拉力因素。也就是说,光棍的形成因素,高度嵌入在村庄伦理和家庭伦理之中。

结合上述分析,可将光棍的内在原因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村庄卷入全国性婚姻市场的程度;二是婚姻成本的高低。就前者而言,卷入全国婚姻市场的程度越高以及所处地理区位和经济状况越差的村庄,越可能产生大规模的光棍群体。就后者而言,婚姻成本越高的地方,子女的婚姻越需要父母的支持,而支持程度越高,成为光棍的可能性越小。相反,则会增加成为光棍的机会,从而构成因父母责任缺失所导致的光棍类型。上述两层因素共同形塑出了广西、山西、川西平原等地域农村不同的光棍类型。下文将分别展现这两层因素在三个不同地域的影响情况。

1. 全国婚姻市场竞争的卷入程度

在我国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全国婚姻市场竞争的卷入程度衡量了男性对女性资源的竞争状况。在女性资源相对稀缺的前提下,男性竞争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其对女性吸引力的大小。男性拥有资源的多少,则是影响其吸引力大小的决定性因素。这说明,对全国婚姻市场竞争的卷入程度的不同,不同地区的男性所面临的对女性的竞争程度也会存在差异。从人口的角度来说,我国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人口流入地区,这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为代表;一种是人口流出区,这以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农村为代表。于是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则成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农村村民通过人口的流出卷入到了发达地区所形塑出来的全国性婚姻市场当中。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同属于中西部农村,它们对全国婚姻市场竞争的卷入程度依然存在差异。广西 X 村、山西 T 村和川西平原 H 村等三地就表现出不一样的卷入程度。

全国婚姻市场竞争的卷入程度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是当地外地媳妇的比例与通婚圈的大小。在广西 X 村,据村民估计,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初出生的这一辈人,他们的娶嫁基本都在本地。本地是指本乡以及邻县范围。广西 X 村的邻县离该村的距离只有不到 10 里的路程。该村女性嫁的最远的不超过 20 里路,可见当地的婚姻圈范围较小且相对封闭。20 世纪 80、90 年代出生的这一辈人,他

们的婚姻圈便迅速扩大,本地媳妇的数量大幅减少,绝大部分都是外地媳妇。X村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已婚男性中,大概有70%的男性娶的都是外省媳妇,且男女双方多是打工认识。与之相应,当地的年轻女孩也越来越多地嫁到外地,甚至是外省。比如X村下面的一个自然村老村,有60名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男性,除去死亡、无法得知情况以及上大学的情况,共计有30名男性结婚。这30名已婚男性中,有15名男性的媳妇来自本市范围之外,其中有9名男性的媳妇来自于外省。再比如,X村的另一个自然村周村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男性共计45名,其中已婚男性有17人。这17名已婚男性中,有11名的媳妇属外地媳妇,其中又有9名男性的媳妇来自外省。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当地已经高度嵌入于全国婚姻市场的竞争之中。X村的男女青年,一般都是去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地区进厂打工。广西X村地处国家贫困县,工商业不发达,就业机会缺乏。由于广西X村具有离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地区较近的优势,因此,去这些地方打工,自然成为当地农民的最优选择。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是我国工商业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国各地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的汇聚地。于是,在务工地点寻找配偶,便成为当下新型的婚恋模式。相对于很多其他地方来说,人口的大量汇集为这个地区孕育出更广阔的婚姻市场提供了可能。这也意味着这个地区面临着更为剧烈的婚姻竞争。

广西位于我国经济低洼区,经济上的整体贫困使当地农村男性在全国竞争性的婚姻市场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婚姻市场中的女性在进行婚姻对象的选择时,往往不是根据交往对象的个人品格,而是根据其身份上的地域标签。“广西”在她们看来,即意味着贫穷。以至于当地自己人都说,即使性格比较外放的个人能够找到媳妇,但是回到家乡后的不到一两年,媳妇还是会跑掉。此外,本地女性资源的大量流出以及外嫁也增加了男性娶本地媳妇的难度。这可与2013年7月笔者在浙江地区的调研经验相互印证。浙江属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是外来人口的流入地,具有突出的经济区位优势,外地女性都有较强意愿嫁入当地。因此,在浙江农村,无法娶到本地媳妇的底层村民依然可以通过娶外地媳妇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这种情况在当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经济贫穷、年纪大的村民娶到年轻漂亮外地媳妇的情况并不少见。在以往村庄比较封闭、婚姻圈范围较小的年代,女性资源只能内部消化。在男女性资源相对平衡的前提下,只要男性本人没有身体残疾或生理疾病,不论经济条件如何,都有成婚的可能。因此,那个年代的光棍问题不突出。目前,广西X村的大量光棍是当地卷入全国竞争性婚姻市场程度较高,而又处于全国经济低洼地带这两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地的光棍类型也主要表现为婚姻市场竞争失败型光棍。

较之于广西X村对全国婚姻市场的高嵌入,山西T村和川西平原H村对全国竞争性婚姻市场的嵌入程度则较低。从T村和H村的情况来看,当地通婚圈多在本乡镇、本县或本省范围,外省媳妇极少。这可从这两个村庄年轻男女的务工半径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山西T村的男女青年去北上广等发达地区城市务工的情况很少,他们多是在县城或是太原市打工。农忙时,还可回家帮忙。虽说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男性有部分借助打工机会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来找寻伴侣,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男性是依靠亲戚朋友说媒的方式找寻伴侣。一般来说,亲戚朋友的关系网络主要集中在本地,所能辐射的范围有限。而且山西T村所在县城,乃至太原市对全国人口的吸纳程度也远远比不上珠三角等地区。因此,当地的婚姻市场范围比较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当地对女性资源的竞争,主要为当地人的内部竞争。川西平原H村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以南,距都江堰市区仅2公里,西距温江城区18公里,东至成都市区30公里。由于便捷的地理位置和交通,该村的青年男女也主要是就近务工,很少到省外务工。因此,当地的婚姻圈多限于本省范围,尤其是川西平原地区。较小的婚姻圈使得当地农村男性面临着较小的婚姻竞争。从这个角度来说,山西T村和川西平原H村则较少出现婚姻市场竞争失败型光棍。

2. 婚姻成本与代际支持程度

结婚是有成本的,它需要一定的资源量做支撑。结婚所需的成本主要包括彩礼、建房、办酒席以及其他附属品的花费。从全国的总体趋势来看,婚姻成本呈现出持续攀高的态势,已然成为家庭的一种负担。但是,婚姻成本在全国不同地区并非均质分布,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从广西X村、

山西 T 村和川西平原 H 村的调研来看,它们的婚姻成本情况就存在很大的不同。比如,广西 X 村和川西平原 H 村的彩礼就比较随意,婚姻成本较低。广西 X 村,男方娶一个本地媳妇所需彩礼大概在五六千元左右,有些娶外地媳妇的甚至没有彩礼,更不用说建房或买房等方面的花费了。川西平原 H 村,彩礼也只是仪式性的表达,数额大概在几千到一万元左右,女方也没有建房或买房的硬性要求。山西 T 村则不同,所有婚姻花费总和大概在二十万左右,其中便包括彩礼、“三金”、新房等各项花费。有的女方家庭甚至要求男方要到镇上或县城买房,在这种情况下,婚姻花费将更多。

自古以来,父母都承担有为儿子结婚成家的责任,这一责任又是通过为儿子结婚成家提供支持资源来表达。家庭资源也借助子女结婚的契机进行代际转移,进而构成子代家庭独立生活的经济基础。但是,父母对子代的支持程度会因地方传统的差异而在不同地域有不同表现,并且深受各地域特有的家庭伦理影响。广西 L 村和川西平原 H 村父母对子代结婚只承担低度的有限责任,即父母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为儿子结婚提供支持,超出父母能力范围之外的成本由儿子自己承担。山西 T 村则不同,父母对儿子结婚有绝对责任。儿子结婚的所有成本都由父母承担,当地的父母往往也会竭尽所能想尽各种办法为儿子结婚。在自身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他们会通过借债等方式提前垫付资金,再将自己的余生投入到还债的任务之中。

广西 L 村和川西平原 H 村的父母对子代结婚都是承担低度的有限责任,但是其背后的逻辑却不一样。广西 L 村属于南方宗族性村庄,该地村民有强烈的生男偏好和传宗接代的欲望。然而,对于儿子结婚生子,在父母看来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虽然父母有为儿子成家、为家族传宗接代的价值性需求,但这种需求并不足以推动他们产生实质性行动来支持或倾尽全力帮助儿子结婚^[1]。而且,在以往地域社会相对封闭的时期,女性资源的低流动使得当地父母也无需为儿子结婚的事情焦虑。父母不会给予子代更多的支持,子代对父母也没有过高的期待。在当前广西高度卷入全国婚姻市场竞争的情形下,结婚更是成为子代个人的事情。面对严峻的婚姻竞争形势,父母再多的努力也难以扭转当地男性在婚姻市场竞争中的落败趋势。这是由当地的贫困是属于地域性贫困的现实所决定的。再者,由于当地传宗接代的价值需求是通过集体性方式来实现的,所以只要家庭中有一个儿子结婚,那么其他儿子是否结婚就不再构成父母的绝对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父母以及未婚儿子的焦虑,也弱化了他们为了结婚而做出的努力。这种机制的存在进一步助长了当地光棍的产生。当父母对子代成婚的天然期待遭到全国婚姻市场的挤压以及所处地域又处于经济上的低洼地带时,当地男子的婚姻便成为一个相当具有挑战的问题。

与广西 X 村相似,川西平原 H 村的父母也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儿子娶媳妇。在当地村民看来,娶不到媳妇是儿子自己的事情,是他自己没本事的表现。因此,当地父母不会为儿子娶不到媳妇而感到焦虑,代际呈现为一种弱责任关系状态。川西平原属于原子化地区,父母与子代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且相对独立。在结婚的事情上,父母只是依照其个人意愿对儿子给予有限支持。此外,在当地彩礼不高的情况下,子代对父代的资源依赖性也并不强,父母的支持对当地男性能否结婚成家不具有绝对的重要性。

山西 T 村则不同,该村的父母对子代体现出一种强责任关系。而且与广西 X 村不同,该村的兄弟之间在结婚成家的事情上表现为一种高度对等平行的关系。所有儿子的结婚大事,都是统一地指向父母,父母有责任为家里的每个儿子不遗余力地提供资源支持。这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子代对父代资源的过度依赖,以至于当事者自己对个人的婚姻大事持一种消极不作为的态度,全交由父母操劳。而当地父母也是以一种高度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儿子的婚姻事业当中,并转化为实际行动。此外,当地兄弟之间的弱伦理责任关联对纵向代际伦理责任关联的强化,使得父母对每个儿子的成婚都有同等的责任。也就是说,结婚是每个儿子对父母的权利。从子代的角度来说,一旦脱离父母的支持,他们的婚姻就会成为问题,进而有沦为光棍的危险。巨大的婚姻成本又给当地父母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尤其是在当地存在强烈生男偏好的情况下,父母的这种压力又会成倍增加,甚至不堪重负。从这个角度而言,因父母无力承担高昂的结婚成本所造成的父母责任缺失型光棍便成为当地农村的主导光棍类型。

至于川西平原 H 村,如上文所述,它一方面面临着较小的全国婚姻市场竞争压力,一方面婚的低成本又使当地男性在结婚事情上对父母资源支持的需求很低。并且,在当地结婚本身又完全属于年轻人自己个人的事情。这三重因素的存在意味着该村很难形成婚姻市场竞争失败型光棍和父母责任缺失型光棍,而更可能出现自致型光棍这一光棍类型。当地村民对适婚男子仍处于未婚状态的原因多归咎于缘分未到或姻缘未到。当地女性在进行配偶的选择时,家庭经济条件也不是她们考虑的主要因素,她们看重的更多是彼此之间的感情,以及对方的品格和能力。所以,村庄中的部分男子娶不到媳妇,绝大部分都主要是因为其自身的品格、能力不足以吸引女性,即成为自致型光棍。

四、结 语

光棍问题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农村又是光棍问题的重灾区。因此,对农村光棍形成原因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综合上文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全国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越高而所处地理区位及经济条件状况越差的农村,更容易产生婚姻市场竞争失败型的光棍类型;第二,婚姻成本越高且对父母资源依赖性越强的农村,更容易产生父母责任缺失型的光棍类型;第三,全国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较低,以及因婚姻成本较低对父母资源依赖较弱的农村,更容易产生自致型的光棍类型。

表 3 光棍形成原因的差异比较

案例村庄	全国婚姻竞争市场卷入程度	婚姻成本	代际支持依赖程度	主导光棍类型
广西 X 村	高	低	弱	婚姻市场竞争失败型光棍
山西 T 村	低	高	强	父母责任缺失型光棍
川西平原 H 村	低	低	弱	自致型光棍

这三个结论分别对应广西 X 村、山西 T 村和川西平原 H 村(见表 3)。因广西 X 村和川西 H 村婚姻成本较低,所以父母在资源上的支持程度不是影响该村光棍形成的主要变量。同样,因山西 T 村和川西 H 村对全国婚姻市场的卷入程度较低,所以也较少出现全国婚姻市场竞争失败型光棍。由此可见,各地区农村光棍的主要类型因影响变量高低、强弱程度的不同而表现出相应的差异。因此,地域差异视角的引入有利于我们充分认识到我国农村主导性光棍类型形成原因的复杂性。此外,由于广西 X 村和山西 T 村光棍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来源于外在的结构压力,个体突破这一压力的难度较高,因此可能表现出较大的光棍比例。而川西 H 村的光棍主要是取决于个体性原因,在群体分布中带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当地的光棍比例可能相对较低。当然,这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参 考 文 献

- [1] 刘燕舞.几千万光棍的社会风险[J].南风窗,2014(14):44-46.
- [2] 王德福.中国农村家庭性质与变迁再认识[J].学习与实践,2015(10):85-91.
- [3] 刘升.“婚姻株连”:理解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框架[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4(3):98-105.
- [4] 余练.多重边缘者:基于对 D 村光棍群体社会地位的考察[J].南方人口,2011(6):8-15.
- [5] 王磊.农村通婚圈变动对于男性婚配困难的影响[J].青年探索,2013(6):55-61.
- [6] 石人炳.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6(1):32-36.
- [7] 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J].青年研究,2010(3):24-36.
- [8] 陈锋.依附性支配: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一种解释框架[J].西北人口,2011(1):83-87,94.
- [9] 刘爽,郭志刚.北京市大龄未婚问题的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9(4):14-20.
- [10] 张春汉,钟涨宝.农村大龄未婚青年成因分析——基于湖北潜江市 Z 镇 Y 村的个案分析[J].青年探索,2005(1):17-19.
- [11] 李永萍.渐衰与持守:宗族性村庄光棍的生成机制[J].中国青年研究,2015(5):59-65.